

【印度】苏奇塔·高希 著

张永超 译

春 雨 校

中 印 关 系

中 的 西 藏

(1899—1914)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中印关系中的西藏

(1899—1914)

〔印度〕苏奇塔·高士 著

张永超 译

春雨 校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冯 良

封面设计 翟跃飞

中印关系中的西藏

(1899—1914)

(印度) 苏奇塔·高士 著

张 永 超 译

春 雨 校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 1/32 印张: 7.75 印数: 1—1,500

1987年1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3·48 定 价: 1.30元

(内部发行)

编 者 的 话

出版于1977年，涉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区域性国际关系政治史的《中印关系中的西藏(1899—1914)》一书，为印度人苏奇塔·高士所著。作者当时是印度加尔各答雅达普尔大学讲师。

本书以我国西藏为焦点，广泛地评述了1899至1914年间，英（印）政府与我国满清政府、袁世凯政府，乃至俄国政府，围绕西藏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风貌。作者纵横捭阖、广证博引，其清晰度、灵敏度都是很精到的。但遗憾的是，融贯全书的主旨却相当陈旧，不过是啸声于本世纪初的所谓“西藏独立”的又一次鼓噪。

与那些宣扬“西藏主权”的调子没有什么两样，作者也意在为《西姆拉条约》的签署和“麦克马洪线”的强划寻找一个口实，只是显得更为偏激、自私罢了。十分狭隘、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作者不能，也不可能客观、公正地面向历史事实，并做出正确的估论。在“麦克马洪线”这一问题上尤为如此。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西藏地方而阴谋设计的所谓“中印边界线”，是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

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在德里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这条线，把历来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了当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该线。并且曾就英、印对该线以南地区的逐步入侵，向英国和以后的印度政府多次提出抗议。

但是，对此，本书作者却充耳不闻、盈目不睹，一撕学术外衣，弃真理于足下，极力效法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为其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大动口舌、诡辩侈议，实在有辱学者冠冕。

自然，这一英帝国主义者残留的后遗症，无论对于我国，还是印度都是沉重的。因此，一个正直的学者，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努力澄清事情真象，以寻求问题的最后公正解决。而本书作者的治学态度却十分令人失望。

我们翻译出版这本史论不确、谬误颇多的著作，目的是希望它能给我国的对外关系以及西藏地方史的研究一个参考，哪怕是反面的呢？

在编辑过程中，因编者经验、能力有限，其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望读者指正。

一九八六年七月

译 序

《中印关系中的西藏（1899—1914）》一书，于1977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作者苏奇塔·高士是印度人，哲学博士，在写作本书时系加尔各答雅达普尔（Jadavpur）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1899至1914年，历时十五年，这一历史时期堪称西藏的“多事之秋”。本书在阐述以西藏为主要因素的中印关系的同时，还追溯了西藏以往的历史：从西藏在“世界屋脊”上的崛起，到松赞干布王聘娶唐室文成公主为妃；从元世祖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国师”和“大宝法王”，到五世达赖喇嘛赴北京觐见清世祖顺治皇帝；从公元七世纪佛教在西藏的伊始，到十六世纪宗教的改革乃至黄教的兴起；从准噶尔及廓尔喀的入侵，到西藏内部的权位之争，等等。

本书以中印关系为论题，重点回顾了这十五年中西藏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包括：帝俄对西藏的觊觎，荣赫鹏率军侵藏，张荫棠在藏推行的改革（按：查办藏事），赵尔丰在川西藏东的活动（按：西康的改土归流），十三世达赖两次出逃（按：逃往蒙古和印度），以及辛亥革命爆发后川军在藏哗变和西藏驱赶汉人的行动。同时，还涉及到达赖喇嘛的两次革职和他在流亡期间通俄联英的历史。

本书作者通过大量引证公开发表和未公开发表的官方档

案、私人信件以及历史资料，并通过叙述1904年《拉萨条约》、1906年《英中条约》、1907年《英俄条约》、1908年《藏印通商续约》及伪称1914年签订的《西姆拉条约》的历史背景和缔结过程，分析了这些条约的法律效力问题和当时中国政府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历次谈判中坚持对西藏领土主权要求的原则立场。其材料较新颖，内容详细，对于藏学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但是，必须指出，作者因其阶级地位和政治立场所局限，不可能对西藏在中印关系中的地位作出较公正的评价，尤其是不可能对中国在藏主权给以肯定。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书中多处提及“西藏事实上的独立”问题，称西藏为“国家”，并以大量篇幅侈谈“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有时甚至连“宗主权”都不予承认。更有甚者，作者在书中反复阐述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确定“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诡称：“英藏双方代表于3月24日和3月25日的换文，证明了会谈的结果，构成了1914年的《英藏边界协定》（按：即《西姆拉条约》）。”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伪造。

关于“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问题，国际上有过不少较公正的评论，认为由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没有正式签署，因而它毫无法律根据和约束力。著名国际评论家阿拉斯太尔·蓝姆指出：即便《西姆拉条约》被英国和西藏全权代表草签而未被他们正式签署是个事实，西姆拉会议也是以文字游戏而告结束的。他由此断言：“西姆拉会议未达成任何有效的协议。”英国西藏问题专家、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英国驻四川省打箭炉（按：今康定）总领事及驻华大使馆参赞

的台克曼爵士在其所著《东藏游记》一书中称：“西姆拉会议最后于一九一四年夏天宣告破裂，未达成任何协议。”这也同样说明所谓《西姆拉条约》是完全没有法律效力的。

众所周知，所谓《西姆拉条约》实则是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导演的一场丑剧。至于“麦克马洪线”更是一桩秘密交易的产物。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英国代表唆使下，进行暗地活动，双方在会议之外，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通过秘密换文，划出了那条臭名昭彰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企图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在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拒绝批准其全权代表正式签字的情况下，英国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下通过所谓《英藏声明》，签署了“西姆拉条约”和标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以图造成“西藏独立”的既成事实，并证明“三边条约”的法律效力，这实在是一种卑劣而又非法的勾当。

鉴于书中一再提出“中国虚构的宗主权”、“西藏独立”、“缓冲国”以及“阿萨姆喜马拉雅”等问题，人们不难看出作者所持的政治立场和本书的写作意图。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本书尚有印度扩张主义者反华叫嚣的余音。值此提醒读者，务必从中吸取合理的内含，排除谬误的部分。

考虑到我们是在研究西藏地方历史，听一听世界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西藏地方涉外问题的有关评论，尤其是听一听反面的观点和意见，对我们大有裨益，并且非常必要。因此，在翻译中尽量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保持作者的政治倾向，对原作中的观点、提法和有碍于中国主权方面的部分，甚至是诬蔑不实之词，均未作“为我所需”的改动，力

求与原作思想内容相一致。对书中涉及的地名、人名，除少数外，大都按正式书刊中已有的译法译出，有的加了注释；对有关历史事件也通过查阅历史资料进行了核实。由于译者翻译水平有限，尤其是藏史知识缺乏，译文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谨请读者批评指教。

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承蒙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社会科学院以及外交部有关老师和编辑同志的亲切指导和帮助，值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永超

一九八六年一月于拉萨

原 序

众所周知，中国对东段印度领土的要求，是以否定麦克马洪线作为既定国际边界线的合法性为前提的，其理由是，印度对这块有争议的领土缺乏有说服力的占有和管辖的证据，而且所绘制麦克马洪线的1914年《西姆拉条约》是无效的，因为它从未被中国批准，还因为在《西姆拉条约》缔结时，西藏不是主权国家，无权根据协定、公约、条约或其他方式确定它的边界。

西藏位于印中两国之间，它过去是、现在是、并将继续是整个印中关系史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还将在这两个国家的边境政策中占据显要位置，不管控制这些地区的政府性质如何。

本书研究了1914年以前西藏在印中关系中的作用，力求确定中国对西藏行使宗主权的性质，阐明它的来龙去脉及其持续的时间。我尽力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地位，研究了1898年以前它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仔细考察了十八世纪清朝对西藏实行保护的短暂时期。

对于专有名称的拼法，我均使用现代书刊中通用的形式，或者采用英国官员办期刊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拼法。

后面各章中，我着重叙述了这个时期发生于西藏的影响中印关系的重大事件。这方面必须指出：中印关系是指中国

和英属印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本书所研究的这一时期内，英国在印度享有支配权。我仔细考察了中印两国对待西藏的政策，这不过是因为有必要了解和估价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和态度。

由于我主要论述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和影响这些关系的地方事务，故没有着力于名人知士的描写；纵然谈及他们，也是因为介绍他们的背景，对于了解他们代表各自政府所实行的政策是必要的。在这一过程中，我详细地解释和分析了有关政策和外交行为的事件。

我之所以选择1899年作为研究的起点，乃是因为这一年标志着中印关系旧时代的结束和新纪元的开始。埃尔金信奉不干涉西藏的政策。1897年，当寇松就任印度总督时，他对西藏推行积极政策，打算在印中两国之间建立缓冲国，并把俄国排除在外。

这一时期(1899—1914年)对于中印关系至关重要。中国此时在西藏的活动使英国方面警觉起来。1910—1911年间，英属印度开始意识到印度东北边境的安全问题，并极力通过考察、勘察及对该地区行使直接管辖的方式，使这一边境地区趋于稳定。印度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藏的地位，它对中国力图把西藏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感到惊恐。

随着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人对西藏的统治被推翻，西藏于1912年宣告独立。在西藏舞台上演出的中印关系的历史性戏剧于这一阶段达到了高潮。出于对整个局势作出重新估价的目的，英国主持召开了1913—1914年由印度、中国和西藏派代表参加的西姆拉会议。

这一研究既不是假定的和推理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

对真实历史形势的客观分析，以便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当今印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谈论这一涉及到自己祖国的引起争论的关系时，担保百分之百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科学性，也许不是凡人皆有之事。不过，本人有意地作出努力，让事实和情况自己出来说话，以排除任何个人的或民族的偏见。

苏奇塔·高士

目 录

译序

原序

第一章	历史背景	1
第二章	渗入西藏的强硬措施	13
第三章	西藏在1904年以来印中对话进程中的作用	59
第四章	重评英国对华政策	111
第五章	英国对华新政策	157
第六章	综述与结论	209
附录一	中国政府革除达赖喇嘛名号的圣谕 (1910年2月)	
附录二	总统令 (袁世凯, 1912年4月21日)	
附录三	达旺地区摘记	
附录四	1914年7月3日声明	

第一章 历史背景

从地理上讲，西藏属于中亚高原。它大致处在北纬二十八度至三十六度和东经七十九度至九十九度线以内，同中国和印度有共同边界。它毗连中国本部（即十八省），沿云南、四川和甘肃省（应为青海省——译者注）的边界线长约一千四百英里，与新疆接壤约一千三百英里。它与印度以及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克什米尔诸国，有着大约二千英里的共同边界。俄国边境与西藏毫不沾边。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将两国隔开。历史和传统都表明，西藏位于俄国在中亚扩张的范围之内。因此，西藏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亚洲三个最大的陆权国家——中国、印度和俄国——的政治枢纽。所以，西藏在本书追忆期间的中印关系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独立的西藏

随着公元七世纪佛教伊始，西藏从“野蛮蒙昧”状态中崛起。这时，正是松赞干布王（公元633—698年）统治时期。一般相信松赞干布出生于西藏西部边远角落的拉达克^①地区，印度文明最初从印度河流域渗入这一地区。西藏的真正历史也正是从此开始^②。松赞干布王通过一匡许多交战首领于麾下，而统一了全西藏。公元635年，松赞干布率军亲征中国西部地区^③，迫使大唐皇帝媾和，要求并最终聘娶了唐室公

主为妃。佛教把中印两国许许多多的教徒吸引到了西藏。④松赞干布统治下纂修的藏经正是基于梵文经本的。⑤

引人注目的是，从七世纪到九世纪，西藏人竟然能够在干布王的长期统治下，连续坚持广泛的军事活动。柏尔写道⑥：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没有逃脱西藏人的侵略。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西藏、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互惠的。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除了与四川和云南的边境部落“礼尚往来兼有小冲突”之外，西藏和中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交往。

1200年，当蒙古人从阿尔泰喀喇昆仑山发动征服世界的战争时，西藏首领以归顺成吉思汗（1207年）的办法实现了和平。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汗意识到同西藏建立宗教联系的政治利益，因此于1270年⑧改信喇嘛教。

忽必烈汗册封八思巴为“国师”以示报答，并授权他管辖（1）包括卫藏十三万户的西藏本部，（2）藏东南（康区），（3）藏东北的安多地区。⑨

在西藏和蒙古皇帝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基本上同俗人与其教士之间的关系相类似。由于忽必烈汗时代作出的这些安排，萨迦寺大喇嘛成为元朝皇帝⑩的国师和法王。作为报答，他们又希望元朝天子们能真正保护西藏。

然而，这些关系并没有幸免于元王朝的没落（1368年）。在此后三个世纪里，明朝皇帝统治中国期间（1368—1644年），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中国和西藏之间仍维持着某种宗教的或政治上的联系。⑪

就在这几个世纪里，以宗教改革家宗喀巴⑫为代表的黄

教逐渐兴盛起来，并发生了由俺答汗尊授的达赖喇嘛^⑬圣职任命之事。

当五世达赖喇嘛（俗称大五世）应当时中国满清皇帝顺治的邀请去北京访问时，皇帝以通常赐于独立君主的所有正式礼节接见了，因为皇帝为了在蒙古人^⑭中间建立满族统治，希望得到他的联盟。

由此可见，直到十八世纪前二十五年为止，西藏还是处于满清帝国范围以外的一个独立国家。

西藏与中国的关系

1717年，一支厄鲁特准噶尔军队从土耳其斯坦侵入西藏，公开宣称要以真正的转世^⑮取代假达赖喇嘛。西藏人在绝望之中向中国皇帝康熙求援以抗击入侵者。中国派出的第一支军队因遭受蒙藏联军^⑯袭击而惨败于西藏高原，但是大清皇帝并没有就此罢休，1720年又派了两支军队，成功地攻占了拉萨，征服了西藏，赶走了准噶尔侵略者^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军队征服该国，这一胜利确保了满清王朝对西藏的宗主权。

1728年，平息西藏内战之后，中国在拉萨驻扎了一支远征军，以支持达赖喇嘛政府^⑱。西藏噶厦在颇罗鼐台吉(Phola Teja)领导下进行了改组。颇罗鼐台吉是内战的胜利者，曾一度是拉藏汗的支持者，他奏明皇上任命了两名文官，史称驻藏大臣^⑲。这就为满清对西藏连续近两个世纪的封建君主主权位奠定了基础。

但是，需要指出，满清对西藏的势力影响（除有短暂时

期外)从来都不是以西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厢情愿为基础的。满清通过驻藏大臣对西藏实行的监督,既不严格又不稳定。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Ghurme Namgyal)组织了一次排汉起义,结果被驻藏大臣诱入圈套,惨遭杀害,而驻藏大臣又被一伙西藏暴民②谋杀。一如既往,这一事件也同样招来了中国的讨伐,使之再次征服了拉萨。紧接着又是一系列改革,导致了西藏政府③的改组。皮特奇(Petech)倾向于把这次起义贬低为只是一场市民暴动和粗暴行为,纯粹是一场局部性突发事件。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起义终归是发生了,而且它的矛头直指中国人,这一事实也许说明,排汉情绪正向表面沸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需要指出,1720—1912年期间,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影响随着清朝在中国本部的运数变迁而盛衰消长。更为有趣的是,中国驻藏大臣只是在达赖喇嘛未及法定年龄时期或两代达赖喇嘛④的空位时期,才能在西藏施加一定的影响。

西藏同英属印度的关系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国同中国的交往限于在广州通商。因此,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试图越过喜马拉雅山脉⑤发展英中关系就不足为奇了。

1772年,不丹人袭击库奇比哈尔(Cooch Behar)⑥,使哈斯丁斯(Hastings)有机会打开同班禅喇嘛的通信联系。1774年,哈斯丁斯派出一个使团,表面上是由波格尔(Bogle)⑦率领的出使班禅喇嘛宫廷的贸易使团。哈斯丁